

论 文 提 要

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成功的反腐败的斗争。这场斗争大体由四个相互衔接、相互交错的阶段组成，速度快、效率高，堪称为一场“漂漂亮亮”的“淮海大战”。

这是一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过的廉政风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一）通过它，中国共产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色；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机关表明了自己是彻底实现“廉价政府”主张的政权。（二）不仅反贪污，而且一切大大小小的浪费和官僚主义都在反对之列；不仅进行“三反”，而且进行“五反”，这就是努力在更深层次上清除腐败现象。（三）这场斗争之所以波澜壮阔、惊天动地，是由于我们党真心实意地依靠了群众，广泛彻底地发动了群众。（四）最根本的一条是有党的正确、切实而有力的领导；因而整个斗争的发展既迅猛，又有秩序，没有失控，没有太大偏差。

这场斗争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这一场斗争，总结其经验，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历史环境。

试论建国初的反腐败斗争

匡 莘 坚

1951年底,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取得伟大胜利,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成就,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天下大定”,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持续半年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建国初在经济领域内清除旧社会污毒的一场政治运动;也是在执政党内清除腐败现象的一场重大斗争。这场斗争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显示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表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我们党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领导力量。这场斗争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亲历过的人怀念它;耳闻过的人向往它。作为一场反腐败斗争,它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回顾:速战速决的政治战役

建国前夕,对于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可能产生腐败的问题,党中央抱有高度警惕。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要求全党“预防这种情况”。②不久,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在登车前意味深长地说:“进城去‘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③

建国后两年,1951年10月,东北等地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一些干部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事实,立即引起了中央的严重注意。11月下旬,中央批转了东北、西南、华北三个中央局有关反对贪污、浪费等的报告,决心“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实现七届二中全会停止腐蚀的方针”。④12月1日,中央正式作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定。不久,又发出指示,要求党政军各部门在接到指示的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內,把斗争开展起来。12月29日,代行最高权力机关职权的全国政协委员会发出指示,强调增产节约运动必须与“三反”斗争相结合,提出要彻底肃清腐朽的剥削阶级损人利己作风和反动的国民党作风的影响。由此,在毛泽东的直接督促和悉心指导下,“三反”斗争在全国各地的党政军各界领导机关陆续展开。

中央机关的斗争具有决定全局的意义。在头一个多月时间里,只有少数部门比较好,多数单位则认识不足,指导不力。12月4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有党、政、军、团、群的部长、处长级干部五百多人参加。中央委托薄一波、安子文出席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明确提出要求,限期于1月1日到10日,各部门及其下面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违者,不论哪一级领导干部,一律撤职查办。会上还宣布处理几名高级干部,全场为之振奋。许多单位领导人当日回去,连夜开会。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

团拜会上公开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许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整日开会。至元月7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召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大会，并向中央作出报告。随后，“三反”斗争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进入高潮。

按中央原来部署，是一个月左右解决问题。1月初，根据部队经验，认为可以加快，两星期左右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即五天发动群众，七天民主检查，三天做结束工作。1月下旬，随着斗争的发展，暴露出凡属大批用钱管物的机关均有大批的贪污犯，且均有大贪污犯；而许多单位的领导存在右倾情绪，对此估计不足，斗争很不彻底；于是考虑重新部署，增加一个“打虎”阶段，时间延长半个月左右，大体到二月底“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大老虎”（贪污万元以上）实际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队伍内的堡垒。“打虎”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为了夺取全胜，必须内外夹击。1月26日，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是大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内部的“三反”斗争。

2月1日，从北京开始，各大区先后举行公审大会，对于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从严惩处，对其中的罪大恶极者处以死刑；对于能立功自赎的大贪污犯则保留悔过自新的道路。2月10日，河北省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宣判死刑。对大贪污犯采取“大压大放”政策，为后来的“打虎”斗争造成十分有利的形势。为了乘胜前进，中央再次批判了对大贪污犯的存在估计不足的严重右倾思想。从此，各地区、各单位纷纷制定“打虎”预算，并且一再突破；全国上下集中力量“打虎”，由首长挂帅，组织“打虎”基干队，周密地作调查研究，开展政策攻心等。这样，一个个“虎窝”被捅开，一只只“老虎”被擒拿。一些原来以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这时也发现实际是“山大林深虎多”⑤。

2月中旬起，在全国范围内“打虎”斗争进入高潮，右倾情绪基本克服。从此，在斗争的指导上不再强调提高预算，而是强调“严密控制”。例如，限制召开斗争大会；防止逼供信；随时纠正硬凑“老虎”现象；一般停止再挤，个别漏网者在普遍搜山中顺便解决。到二月底，“打虎”的突击阶段在多数地区基本结束，斗争转入正常轨道。与此同时，各地大量锐尖地提出了业务工作、经济工作和生产中的严重问题。经过各级领导的努力，业务工作得到加强，经济逐渐恢复，从三月起生产开始回升。

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件》。24日，政务院命令在“五反”中成立人民法庭，30日又命令在“三反”中成立人民法庭。由此，反贪污、盗窃斗争一般进到核实定案处理阶段。定案处理是巩固和扩大斗争的胜利成果；并非简单地结束斗争。处理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甄别、退赃和定案。

从3月中旬起，各单位认真负责地对贪污分子作甄别工作，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定之。通过甄别，不少假“老虎”或不够标准的“老

虎”都纠正了过来。最后贪污分子的总数减少了65%，做到既不放纵坏人，也不冤枉好人。

3月31日，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规定分别按坦白态度好坏，贪污情节是否严重恶劣，退赃有无实际困难等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处理。4月集中抓了退赃工作，依靠群众对证赃款赃物的来源和去路，掌握真凭实据；对证确凿后由本人具结，群众审查，领导批准，做出结论，作为定案，分别处理。退赃既是挽回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从经济上给贪污分子以制裁，促进其悔祸与改造；同时也借此平息群众的愤怒。全国被贪污的赃款赃物共计6亿元，被追回2亿元，占34%。

在定案处理过程中，体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贯彻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的原则；采取了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贪污不满100元的，一般不以贪污分子论处，除自动退回赃款赃物外，一般不予退缴。对于贪污不满1000元、系偶一失足且能立功自赎者，也免以贪污分子论处，不给处分，惟酌予退赃。1000元以上的贪污分子则分别给了行政处分或适当的刑事处分。万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根据情节，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结果在犯有贪污行为的人中，免予行政处分的占75.7%，受行政处分的占20.7%，受刑事处分的占3.6%，受到不同程度处分的人数总共占国家工作人员的4.5%。在受行政处分的人中，大约有70%是警告。为免流浪社会，影响治安，开除的很少。被开除后生活无着的，按劳动就业办法予以解决。受刑事处分或免除刑事处分的贪污分子都经人民法院审判。在受刑事处分的贪污分子中的多数（占44.7%）采用机关管制（一年至二年），留在机关中戴罪工作，不叙职位，剥夺政治权利，但给以学习机会，保障生活供给；部分（占29.1%）实行劳役改造，集中到适当地点和部门实行劳动服务；判处有期徒刑的占25.9%，判处无期徒刑的占0.17%，判处死刑的占0.14%。

对于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也以严肃的态度，分别不同情况作了处理。

5月底6月初，在“五反”先后进入结束阶段的同时，“三反”斗争陆续进入建设阶段。广大干部普遍交待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线，对问题最严重者集中力量予以审查。各单位检查业务工作中的政策思想，在财经工作人员中，大力克服不愿做财经工作，不愿和资产阶级来往的思想情绪。结合整党，整理打乱了的组织，趋势精简机构，大胆提拔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健全干部队伍，某些领导干部回炉补课，对个别有疑问的遗留问题，继续甄别。审查和建立各项制度，主要有财务制度，基建制度，干部的生活待遇（如用汽车、接家属、雇保姆等）的制度，机关“小家务”制度，与资本家来往的制度，人事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等。通过建立各项制度，加强正常的业务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增产节约运动。这样，“三反”就和整党、机关建设，提高工作效率等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说，“三反”运动同时就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

总的说来，从1951年11月下旬至1952年1月下旬，属斗争的普遍发动和初步的坦白检举阶段。这一阶段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花了大体两个月时间。从2月上旬起，全国上下比较整齐的进入“打虎”阶段。这是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大体持续一个月。从3月上旬起，进入追赃定案处理阶段。这是艰苦细致工作的时期，一般都花了两个多月。从五月底起，各地

先后进入建设阶段，大体10天半个月。6月至7月期间，各地先后宣布结束“三反”、“五反”。整个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半年多一点时间。

当时有位先生热烈称颂这场速度快、效率高的斗争为一场“漂漂亮亮”的“淮海大战”。⑥这在古老的中国确是一个奇观。10月25日，中央批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的报告。安子文的报告认为，“三反”斗争处理时间拖得太久，很多地方后期产生了疲惫、松动情绪。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和很严格的要求。它反映了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和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时代节奏。这里迈出的是东方巨人的步伐——它是那样的坚定和明快，不容有丝毫的拖沓和延宕。

评价：惊天动地的历史篇章

建国初的反腐败斗争是中外古今所未曾有过的—场廉政风暴。它卷进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群，考验和审查了数百万党政军民企的工作人员，教育和鼓舞了亿万人民大众，扫荡了政坛上几千年的积弊，全面开创了一代社会新风貌，影响及于几代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一）自觉奉行“廉价政府”主张的宏伟实践

马克思曾经指出，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象英国一样，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等等所补充；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摧毁了这一切，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接着他又说明，“廉价政府”并“不是它的终极目的”⑧。就是说，“廉价政府”既是无产阶级权力机关的一个必备特征，又仅仅是对它的一个起码要求。

新中国，人民政府一成立即一扫旧习，政坛气象为之一新。我们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克己奉公，廉洁勤劳，受到广泛靠誉。例如，“近水楼台”的财政部门，在旧中国是“无官不贪”的；在新中国，其干部30%来自老解放区，绝大多数保持了优良传统。⑨就税务工作而言，税率是接收国民党的，税种还有所精简，可每年税收额23亿元光洋，为国民党的两倍多。上海资本家说：“国民党是复杂简单”——税收条例繁多，可只要贿赂一下就行：“共产党简单复杂”——从山沟里来，土头土脑，看起来简单，可办事认真，一讨论就复杂了。⑩

跟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因全国胜利而自满，没有陶醉在热烈的喝彩声中；而是清醒地看到，党内会有少数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新环境的考验，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在旧中国这块肮脏的基地上建立起“廉价政府”，任务是很艰巨的。于是在发现大量腐败现象后，立即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在我们党看来，这一个个贪污、盗窃事件，不是种孤立的现象，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和单纯的违法乱纪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共产党的宗旨，人民民主政权的命运的重大问题。1952年1月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对这些腐败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因此决定把这场斗争与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同等看待⑪，当作一场彻底破旧世界，为新世界的成长继续扫清道路的斗争；当作一场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旧社

会，全面扭转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斗争。应该说，对于反腐败问题的认识，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全新的境界。无产阶级绝不能象资产阶级那样满足于慢吞吞地、甚至表面地处理几个民愤极大的贪污案件；而是要肃清一切腐败现象，“真正建立起“廉价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曾说到，建国后头两年，河北各地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之所以未能给予彻底有力的打击，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提到高度原则来加以注意”。⑫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基本成分经历过战火或其他形式的严峻考验，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一身正气，所以敢于发动这样的斗争，并能领导人民夺取斗争的胜利。

社会各阶层通过这场斗争的实践，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广大群众认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事”⑬。有人说：“过去我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回可见到事实了。”⑭过去有些人认为“贪多务得是人类本性”，现在看到“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⑮有些留用人员感慨地说：“国民党贪污成风，共产党两袖清风。今后不能再贪污了”。⑯大同煤矿工人“三反”后才真正当家作主。他们高兴地说：“这回可真正解放了。”⑰大学生也有巨大收获。在北京师大，“当人民政府宣判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的时候，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满怀信心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永远不腐化的党”⑱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更是心悦诚服。新疆有位起义将领感动地说：“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⑲

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色；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机关以实践表明了自己是彻底实现“廉价政府”主张的政权。

（二）连根铲除腐败现象的系统工程

“三反”是一个整体，重点是反贪污；但不仅仅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要反。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有若干不同，但却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严重现象，损失也更大；有些浪费逼近贪污，也容易发展为贪污。官僚主义则是贪污和浪费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贪污是腐败，严重的浪费和官僚主义也系腐败。因此，不仅反贪污，而且一切大大小小的浪费和官僚主义也在反对之列。这就是要在更深层上清除腐败现象。有个大军区党委总结道，在“三反”前，对于贪污、浪费的严重现象也反对过，批办了大批案件，处罚了许多人，却未能制止这一狂澜；原因就是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有系统的开展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过着供给制的艰苦生活，普遍以艰苦朴素为荣。但也有少数人在新环境下贪图享受、公私不分，还说什么“我人都是公家的，享受一点公家的东西不算什么”⑳。因此，通过这场斗争，批判资产阶级享乐思想，高扬艰苦朴素的情操，建立和健全防止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制度，这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增强抗拒腐蚀的能力，保持廉洁的传统，是有重要意义的。“三反”以后，制度之严严到偶尔用点公家的信纸信封都要提到公私不分的高度。㉑这是种多么彻底的廉洁奉公精神。试想，除了我们的党，还有哪个阶级和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以享乐为人生目的，以挥霍为个人尊荣的时代，哪谈上什么反浪费！在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高贵的社会里，哪谈得上什么反官僚主义！

贪污的绝大多数是留用人员；浪费和官僚主义则主要出自老干部。刘青山就说过：“老同志们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㉒因此，不仅反贪污，而且反浪费和官僚主义，这就触动了整个领导层。这样，斗争自然会遇到阻力，少数老干部消极观望，满不在乎。但是，

经中央一批评教育，他们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纷纷起来诚恳检讨，一次不行再次，直到群众满意为止。中央财委“三反”的主要经验就一条：“首长彻底作自我检查。”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执政党能做到这样大规模地向自己的领导层开火？还有哪一个政党的干部队伍从上到下能这样高度的一致，对党的事业这样忠诚！

要系统地解决腐败问题，斗争就不能仅停留在党内，而要内外结合，一步步推向社会各阶层。在这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是腐败产生的外部根源；因此，围绕“三反”发动“五反”，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联系起来解决问题。对于一般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则大力加强教育，以期防微杜渐。例如，在批评医护人员的贪污行为时，不放过一双双橡皮手套，一枚枚手术小针，一寸寸肠线。^{②③}青年团员拿公家的擦桌布补袜子等都要受到批评，原因是贪污正是从揩油、占小便宜开始。^{②④}由于做到了这一切，既迅速转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三）依靠群众围剿腐败分子的人民战争

建国初的这场反腐败斗争之所以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就是因为我们党真心实意地依靠了群众，广泛彻底地发动了群众。

群众发动得广泛与否，是斗争能否彻底的关键。群众是天罗地网。贪污分子生活在群众之中，其黑暗勾当再隐蔽也逃脱不了群众的耳目。群众同其朝夕相处，掌握其活动特点和规律，能有效地跟踪追击，揭开其隐秘；能把握其思想脉搏，对准其心态，解开疙瘩。众目睽睽，还能有效地防止破坏事故的发生^{②⑤}，等等。总之，在检举揭发、调查研究、政策攻心，追赃退赃、处理审判及处理后多数人的改造等一切环节上，都离不开群众。当贪污分子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后，就无以施其伎了。许多单位都总结了这样的经验，“三反”前也处理了不少贪污盗窃案件，为什么刹不住歪风？就是因为没有依靠群众，没有形成群众威力。在中国，要彻底清扫旧社会的污毒，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庞大的专业队伍；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对付敌人，依靠群众破坏旧世界，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在对付腐败分子时不能不用、也不该不用的一个绝招。其他阶级之所以不能彻底肃清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脱离群众，不可能依靠群众。

50年代初，广大群众是这样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地行动起来，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斗争一发动，“检举信件如雪片飞来”^{②⑥}机关内外一起动员，检举会上，会计员、保管员、店员、乃至高级职员都纷纷登台。在部队，为了帮助首长，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都动了起来。在社会上，出现了妻子哭劝丈夫，老妈妈开导儿子^{②⑦}，大学生检举父亲^{②⑧}少年儿童帮助哥哥^{②⑨}等动人事迹。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围剿贪污分子，批评腐败现象。社会的深层震荡了。贪污分子要想寻找一块平静的土地，求取精神上的片刻安宁都不可得^{②⑩}。

群众的高度热情，证明了这场代表他们利益和意愿的斗争的正义性；也表明了群众对党的极端信赖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这正是我们党所特有的政治优势。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党也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这种优势。在旧社会，吞皇粮、偷国库，有谁来管？在封建时代，百姓喊冤，路遇清官可能得以昭雪；但是，不敢喊，不能喊，或哭喊声消失在威严和冷漠中的知有多少？在自恃有严密法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对贪污受贿的处理也只能是旷日持久的

个案解决。所谓的“杀一儆百”，实际只能是挂一漏万。而在资本主义法制远不完备的时期里，则是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腐朽没落的东西无所顾忌地泛滥。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几个世纪的惨痛牺牲。

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是简单地喊几声口号所能奏效的。从虎狼横行的旧社会过来的群众，对于开展这样的斗争难免会有种种顾忌。这需要说理，需要有事实，还需要造成一种空气，使得后进阶层，尤其是知情人、利害相关者，看清潮流，为之所动。

发动群众不光为完成任务，对于那些即使不了解情况、不能直接对斗争作出贡献的群众也要发动起来，从斗争中接受教育，乃至掌握反贪污斗争的规律^⑩。而这正是以后开展斗争，防止腐化的坚实基础。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群众是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简单的工具。

上海有条经验，面对面的斗争火力太强，太伤感情，容易造成严重对立，于今后的团结改造不利；因而改取背靠背方式，在底彻坦白交代后再面向群众，接受帮助。^⑪这就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注意保护群众；不仅运用党纪国法制裁报复行为，还尽可能不使群众受到小的伤害，防止“穿小鞋”这类小报复行为的发生。斗争方式上的这种选择是有意义的。

建国初这个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新篇章之所以揭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党的正确、切实而有力的领导。在这里，群众是党发动的，并在党的领导下行动的；各级党组织也是在上级组织督促、指导下活动的。这里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而以自上而下为主。斗争中令行禁止，统听中央号令。例如，农村搞不搞“三反”？何时搞？面多宽？“五反”在哪些城市搞？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轻易发动？都听中央部署。上海市的“五反”斗争一再推迟，也系中央决策。为了保证斗争的健康发展，各地都“三日一会，五日一报”，有经验，及时批转；有偏差，立即纠正。各级党组织既坚持服从统一领导，又放手积极工作，从实际出发独立决策，报请中央批准。例如，关于在斗争已彻底或基本彻底的单位“适时地有计划地予以收缩”问题^⑫；对于在“五反”斗争后期控制新闻报道，以稳定市面，安定人心问题；关于在追赃定案中应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必害怕“老虎”数字下降一批的问题等等，都是这样。这样就既保证了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表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党的驾驶全局发展变幻的智慧和能力。总的说来，斗争的发展是迅猛的；但又是有序，没有失控，没有太大偏差。可以说，这是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反思：历史地看待历史经验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⑬建国初的反腐败斗争发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成功和不足，以及存在着的一些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都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因此，考察这一斗争，总结其历史经验，不能离开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

（一）历史地看待其成功经验

这场反腐败斗争的成功，首先决定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应该承认，刚刚经过人民革命风暴的50年代初，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确实十分优越，甚至是得天独厚。^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加上建国初代表群众利益的斗争的一连串胜利，使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他们坚信“人民政

府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以主人翁的态度无畏地投入斗争；他们信任党，听党的话，忠实地按党的指示行动，因而使整个斗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充分展示了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党的干部队伍，此刻则普遍地廉洁奉公，“忠心耿耿”，腐败分子极端孤立；因而斗争对象相对软弱，阻力小，动力足。这支队伍之所以纯净，除了它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之外，还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社会上广泛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革命队伍中则实行低标准的供给制。因此，投机钻营之辈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误入革命队伍，也会由于不耐劳苦而被自然淘汰。加上党的干部队伍的物质生活大体划一，腐败享乐分子极易暴露，便于及时发现和清除。此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起来的高度纪律观念和战斗作风，也使这支队伍能够忠实地、不走样地执行党的指示，坚定而又整齐地投入战斗。

这场斗争进展得如此顺利，成效如此显著，主观的决定因素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一是在指导思想，看得透，提得高。把它看成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看成是关系人民民主政权命运的“极大的危险现象”，^②实际上的一件头等大事，强调不进行这一正义斗争，我们就会失败。正因为如此，才能有这样的大决心、大动作；而不致顾虑重重，畏首畏尾。

二是在时机选择上，抓得早，抓得及时。见微知著，腐败现象一露头就狠狠刹。广阔的历史视野，高度的政治敏感，疾恶如仇的态度，以及快刀斩乱麻的作风等是作出这种抉择的精神前提。机不可失。等到问题成堆时，再解决就难了。

三是在战略部署上，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有气吞山河之势。自上而下，既打苍蝇，又打老虎，重在打虎；敢于碰硬，首先碰硬；哪里有阻力，就在哪里铲除，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这是战场上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在政治斗争中的自然继续。

四是在斗争形式上，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革命的传统模式。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真心实意的依靠群众，既发动群众，又引导群众和保护群众。

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开展群众规模的政治运动。出于历史的传统和客观的条件，在当时采取这种斗争形式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和成功的。在历史的新时期，由于斗争背景和形势的变化，对于这些经验自然不能简单照搬，尤其不可轻易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但是应该承认，贯串在这些经验中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仍有重大实际意义的。

（二）历史地看待其缺点和不足

建国初的这场斗争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斗争过火。对此应该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作出恰如其份的说明。

例如要求过急问题。当时是用完成军事任务的那种集中优势兵力、冲锋陷阵的办法，以求在短时间内突击解决政治问题的。斗争中，从上到下，各级领导、业务骨干和生产能手全部或大部一度集中于“打虎”斗争，在实际上把这场斗争当成压倒一切的中心，在一个时期内冲击了生产，影响了经济工作。如果斗争一开始要求就不那么急切，在采取重大步骤前能从容商讨，反复听取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其中的某些问题是有可能避免的。——自然，还有些问题是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超出了领导集体固有经验的范围，事先无法预

料，难以避免。不过，如果没有了这些缺点，也许就没有那些优点。疲疲沓沓，迁延时日，坐失良机，是很难使这类斗争取得成效的。

再如工作过粗问题。广大干部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带到这场斗争中，再加上上级要求急迫，督责甚严，下达的“打虎”指标过高，完成任务的时限太紧；因而在实际斗争中很难避免简单粗糙之类毛病的发生。如果能不急不躁，从容从事，上述缺点是有可能避免的。但在那样一个迅雷疾风、凯歌行进的时期，要求平平静静地来处理这类重大斗争，是不现实的。

又如斗争过火问题。我们党的全部革命斗争都是种群众斗争。我们就是靠千百万群众的力量优势来压倒敌人的。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对敌斗争的方法，大量运用到这场斗争之中，“大会压、小会挤”，气氛紧张，方式粗暴，乃致造成逼供信，出现不少错案。这些虽然及时得到了纠正，但已造成对好人的一些不应有的伤害。在那种急风暴雨的群众斗争时代，客观地说，这种过火现象也确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苛责，而是记取；即认真记取付出许多代价而换来的这个教训。

（三）历史地看待其存在问题

能说这场斗争的开展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转变党的工作重点的正确决策吗？不能。建国初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都不仅是从解放生产力这个根本点出发的；而且在进行过程中十分注意使它与生产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密切配合而不相互冲突。在“三反”、“五反”中也如此。不过，由于这类斗争主要是在经济领导机关和城市工商界开展的；还由于缺乏经验，要求急迫，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重大问题未能完全解决好，难免对业务工作、对生产、对经济建设发生冲击。1951年底和1952年初，情况较为良好。从1月下旬集中力量“打虎”和打击资本家之后，对经济和生产冲击就比较大了。但是，由于全党的指导思想当时总的讲是明确的，因而问题一经发现便马上引起高度的重视。通过一段紧张的工作，3月至5月，情况发生变化，到6月底问题大体解决，副作用和消极影响得到克服和消除；并为以后经济更健康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这种偏离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为此，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同时从政治上得到了更大、更有深远意义的补偿。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本色，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必须的。

有人认为，建国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在对制度、人与腐败的关系的认识上始终有盲点。”总是“着眼于事后现象，而不致力于制度的根本。”^④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它已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

历史事实是，制度建设问题当时不是没有抓，而是当作斗争中的一个阶段认真地抓了，并取得了相当成效。在斗争后期建立起来的大量制度，应该说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相适应的。其总的特点是规范性的制度多，监督性的制度少。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经过长期革命熔炉陶冶的党的干部队伍的基本成分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其纪律是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建国后，虽然问题多了一些，但依然是只要有所规范，必能落实。怀疑他们的忠诚是不实际的；以这种怀疑为基础设计出一套严密监督制度来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就忽视了监督制度的建设问题，从而对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在一定的范围内已实际存在的不可

制约的权力，以及权力的滥用和权力与金钱之间的非法交易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时存在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念：腐败现象是长在无产阶级的身体上的资产阶级的毒瘤；它与无产阶级的整个机体没有联系。因而以为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交待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是一切；未能深入研究无产阶级权力如何从内部加以制约的问题。斗争初期，这个问题曾被提出来过。1952年1月中旬，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持群众的民主锐气，防止部队腐化，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的制度，每月开会，通过领导者的检查报告和财经报告等。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极好”。的确，这是无产阶级军事民主制的一个发展，有普遍的重大意义。但是很可惜，这种思路不久就被反击资产阶级的紧张斗争所打断。这样就留下了一个需要继续解决的大问题。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监督，沿着法制的轨道彻底消除腐败现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新时期内，必须继续完成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注释：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6页。
- 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426页，第1439页
- ③转引自《一代廉洁楷模》能源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页。
-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
- ⑤刘澜涛：《在华北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的报告》新华社1952年2月7日讯。
- ⑥见王芸生：《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1952年4月22日上海《大公报》。
- ⑦据1952年8月材料，全国国家系统参加“三反”的达850万至900万人。转引自柳随年等主编：《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378页。
- ⑨见1952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 ⑩《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167—168页。
- 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
- ⑫见《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
- ⑬见195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 ⑭见1951年12月1日《东北日报》。
- ⑮见1952年1月20日《解放日报》。
- ⑯见1952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上海通讯》。
- ⑰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 ⑱师大通讯组：《北师大同学在三反运动中的巨大收获》1952年5月21日《光明日报》
- ⑲见1952年1月23日西安《群众日报》。
- ⑳同⑭。
- ㉑刘汉清：《论以权谋私》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9—20页。

②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③1952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协和医学院积极开展反贪污运动》

④见冯文彬：《积极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2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

⑤1952年3月18日《江西日报》报道：《中国百货公司浮梁分公司三反中破获集体大贪污案》。

⑥同⑤

⑦同⑥

⑧同⑥

⑨1952年2月2日《江西日报》转载《中国青年报评论》。

⑩同⑥

⑪195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接再厉穷追贪污分子》。

⑫参见1952年6月9日《文汇报》载新华社记者述评。

⑬195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⑭《列宁选集》第2卷第513页。

⑮参见薄一波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载《新华月报》1952年1月号。

⑯同④

⑰赵志敏：《反腐败要着眼于制度建设》1990年10月4日《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学院）

说明：

（1）未注明出处的文句和资料均出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江西省档案馆档案。

（3）本文吸收了林廷冠、李矩葆等同志的一些重要意见；李矩葆、林一平同志作了大量的资料工作。